



李济文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杨朗 选编

李济

惟此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
與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信

李濟文存

李濟著
李維新編

李濟

李濟先生遺著
李維新編
李維新編





第 四 期 (总 第 四 十 四 期)

主 编 : 杨 朗 (清 华 大 学 国 学 研 究 院)

副 主 编 : 王 德 山 (清 华 大 学 国 学 研 究 院)

编 委 : 王 德 山 (清 华 大 学 国 学 研 究 院)

王 德 山 (清 华 大 学 国 学 研 究 院)

王 德 山 (清 华 大 学 国 学 研 究 院)

王 德 山 (清 华 大 学 国 学 研 究 院)

王 德 山 (清 华 大 学 国 学 研 究 院)

李济文存

LI JI WENCUN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杨朗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济文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杨朗编.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12

(清华国学书系)

ISBN 978-7-214-19388-9

I. ①李… II. ①清… ②杨… III. ①李济(1896—
1979)—文集②考古学—文集 IV. ①K8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3169 号

书 名 李济文存

主 编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选 编 杨 朗

责任编辑 卞清波 洪 扬

装帧设计 姜 嵩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2.75 插页 2

字 数 297.4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9388-9

定 价 52.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遗产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桢、吴其昌、高亨、刘

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 and 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

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2年3月16日

目 录

导言：李济的生平与学术 1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38

中国文明的开始 79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 125

《城子崖发掘报告》序 135

《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 142

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 144

从人类学看文化 160

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 177

《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序 188

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 196

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 210

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 228

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鸟瞰 269

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 300

李济大事年表 346

启事 354

导言：李济的生平与学术

李济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大家，其名字是与一系列重要学术事项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清华国学院五大导师之一、第一位独立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安阳殷墟的主持发掘者等等。1949年以后李济虽离开大陆居于台湾，不过海峡两岸考古学界的领导人物均是他培养的学生（夏鼐、高去寻、张光直等），应当说他对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李济与清华的缘分颇深，早年是清华学校的毕业生，归国之后又担任清华大学国学院人类学讲师，然而他的治学路径与“国学”不无差异，甚至还多次对传统学术表达过质疑。可以说自始至终，李济都力倡“科学思想”，旨在为中国建立起“现代学术”，并由之而批评传统思想中诸多“阻碍科学思想”的因素，然而在感情上他又往往呈现出一种“中国本位”的色彩。凡此种种特点，在当今仍然令人深思。本文即以李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为核心，论述其时代意义与影响。

一、生平概况

初学时期

李济于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省钟祥县（今湖北省钟祥市），初名

李顺井。其父李权少孤失怙，苦读成名，年轻时即成为钟祥县最大学馆的教书先生，在当地颇有名望。李权的八股文做得好，策论亦很擅长，于文章学深有心得，与此同时，他也精研孔孟程朱的思想，尤其笃信孟子的性善说，其为人刚正而温和。对于教育子弟，他颇有想法，重视因材施教，充分培养孩子固有的品性，且重视当时的新学。在李济年少时，父亲李权即为他朗诵诗歌，教授七弦琴，并且送他进新式小学，使其得以接触“格致”“体操”“东文”等新鲜事物，而到了宣统末年，又决定让他报考清华学校。作为钟祥本地一位大秀才，李权重视培养孩子新知的同时，自然也不会遗漏传统学问，而他的教导方式又比较特别。李济后来回忆道：

我的发蒙读书，并不是由父亲自己教的；因为那时他已是我们的县城内教大学生的最忙的老师了。但是我把《四书》读完后，却没按着传统的次序读《诗经》；跟着念下去的为《周礼》。这件事，我记得最清楚；这完全是父亲一个人的主张……读《周礼》的课程是没完成，至于这一课程对我幼年教育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因为我到了九岁的时候，尚不能提笔写一封简单的家信。我记得很清楚，当我第一次初学写“父亲大人膝下敬稟”这九个字时，我的精神上的苦恼。^①

在儒家经典中，《周礼》不以义理著称，文字也较为枯燥，在科举考试中也不太重要，虽在中古政治改革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自宋以后逐渐式微，到了清代始稍有起色，而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著《周礼正义》一书，才使得《周礼》真正成为经学研究的焦点。这部经学巨著虽重在客观探讨“古制古义”，无所措意于历史上各种经学争论，在经学史上具有不同以往的特点，但在孙诒让眼中，探讨《周礼》仍有保华攘夷、富强国家的经世之意。^② 李

① 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篇中李济原文皆引自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周礼正义》完稿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是李济的幼年时代。关于孙诒让《周礼正义》与清学的关系，参见沈文倬：《孙诒让周礼学管窥》，载沈文倬：《荊園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关于《周礼正义》的“非经学”性质，参见乔秀岩：《〈周礼正义〉的非经学性质》，载乔秀岩：《北京读经说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权让李济学习《周礼》，可能就是这种历史环境影响下的结果，这当然显示出他本人对于时代风潮之敏锐，不过就李济而言，这种具有偏向性之教育的直接后果乃是他未能够完整全面地学习传统经典，不能不说留下了一定的遗憾，九岁尚不能写封简单家信仅是一例。

不过除了《周礼》之外，父亲仍积极地为李济教导过其他传统学问，尤其是自己钟爱的《孟子》。李济对于父亲津津有味讲述《孟子》的场景印象非常深刻，并且自己当时也曾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讲解所感染，不过也是在当时，他就对孟子的某些观念提出了怀疑，例如“以羊易牛”，他认为远远赶不上佛教戒杀生合理。按照李济的说法，他对于孟子某些学说信仰的动摇始于中学时代，他早期的中学教育在北京南城的五城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之前身）。李济之所以从湖北来到北京读书，是因为父亲李权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赴京参加举贡会考（时科举已废），得到了七品官衔，而他不愿到福建做知县，遂留在皇宫内务府听任，还把一家人从湖北接到北京。李济初到北京之时，先在本省人开办的江汉学堂读书，半年后，考入北京名校五城中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当时教授李济那个班国文课的，就有大名鼎鼎的林琴南。不过李济中学教育的大部分时间，乃是在新创办的清华学堂度过，在清华的学习对于李济具有很大的影响。

求学清华

1911年清华学堂首次开学，次年更名为清华学校，李济乃是首批考入清华的学生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也跑了去糊糊涂涂的应了一下考，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监考的人也把他糊糊涂涂的取了。他在清华学堂待了七年半，功课是平平常常，人也是平平常常，玩也是平平常常”。（《自撰简历》）但对于理解李济的学术生涯而言，清华求学的经历可不是“平平常常”这四个字所能概括的。

在当时的中国，清华的清洁、整齐与效率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学校规定每一学生在固定时间到洗澡间洗澡。这样的训练风气之下，李济也

养成了洗“莲蓬浴”、作“健身操”、“守时刻”的个人习惯，等到后来留学美国时，在生活方式上就不会有太多难以适应之处。生活习惯并非与学问毫无关系，因为在李济看来，“清洁”“整齐”“效率”“秩序”此类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人传统的习惯与环境联系差异明显，清华这种具有美国特色的学校生活方式无疑给李济带来了对于西方文化初步的直观感受。^①

就学习而言，李济认为“在这一时间学到的，属于技术性的较多；涉及价值观念的较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清华远离北京市区，交通与讯息皆不甚便利，学生对于政治问题普遍较为冷淡。其次，李济本人受父亲影响，视政治为肮脏下流的事业，而他自己对于宗教也很不感冒，他所关心的是学点“洋东西”，对国家与社会做出贡献。清华学校正是为学习“洋东西”做准备的，其课程安排乃是以学习英文为中心，应该说突出的正是“技术性”。说到价值观念这一方面，李济在一位饶老师的指导下阅读王先谦《荀子集解》，其《天论》篇中的科学与共和思想给李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由此思考为何这些早已提出的原则两千多年仍未得以实行，随之又产生出一系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疑惑，强化了他出国求学的愿望：“放弃了多读中国古书的念头，一心一意想到海外求奇方去！”也正是在清华求学这一时期，李济与父亲李权的思想距离越来越大，李权虽然能够吸收一些新东西，但对于根本破坏传统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以至于骂孙中山为犯上作乱的“杂种”。^② 他也抽出时间为李济讲授韩柳欧苏文章的奥妙，但李济当时始终听不进去，他当时所要的，“只是想透过英国语文，学点中国没有而美国有的东西”。可以说，李济年轻时在感情上即对于传统学术有一种厌倦与不满，他认为中国的未来最需要的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与知识。

在清华期间，李济的课余生活也很丰富，1914年他多次参加学校举

① 李济也认为中国文化内部差异很大，不可一概而论，“中国的妇女的教育，及婚后的工作，可以说大部分与清洁有关”，例如他的母亲与姨妈皆是，见《我的初学时代》。

② 岱峻：《李济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办的“国语演说会”，在辩论中唇枪舌战，1915年也曾出任学校演剧队队长，参加筹办贫民小学的义演。更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李济与四名同学建立了以“励进道德”为宗旨的“新少年会”，其道德之楷模并非中国圣贤，而是泰西名人——尤其是创立新少年意大利会的“意大利三杰”。举凡读书为学、生活起居，会员都要互爱互敬，彼此规过，砥砺德行。后来会员增多，宗旨也添加了“学术研究”一条，成立了“国语演说部”。稍后，又仿照富兰克林修身的方法，刻印了一种自省簿。应该说这种做法既具有基督新教色彩，也体现了儒家传统，所以当时常会中讨论的问题一多半是以王阳明良知做引线。后袁世凯称帝，“新少年会”为避嫌改名为“仁友会”，宗旨也易为“改良社会、服务国家”，会员亦越来越多，但组织社团究属不易，“仁友会”还是难免各种内部与外部的争议。但无论如何，由此可见出李济对于国事之关心，以及他对此怀有的建设路径。（“仁友会”历史见李济《仁友会史略》）

1918年，李济已是高等科四年级生，清华开了一门心理学课程，并从美国请来华尔考教授（G. D. Walcott）授课，李济受好奇心驱使选了这门课，读了半年之后，兴趣越来越大，人的智慧能以科学方法测量（即IQ），这样的说法让他觉得很有意思，用李济的话说，“清华学校最后的这门课程，却帮我做到了美国学业选择的最后决定”（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李济当时就去打听美国哪一所学校的心理系最有名，打听的结果是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城（Worcester）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1918年8月14日，李济在上海东关码头登上了“南京号”远洋客轮，离开祖国，远赴美国留学。

留学美国

李济在克拉克大学一共待了两年，第一年所选的课程多是心理学，成绩也不错，1919年6月即获得心理学文学士学位。但一来他感觉到心理学这门学科未能尽符自己对于科学标准的预期，二来他觉得学心理学在中国没什么出路，而通过在课余的博览群书，他逐渐对于人口学发生

了兴趣。于是在克拉克的第二年,他开始跟随韩金斯教授(F. H. Hankins)转念人口学与社会学研究生课程,1920年6月,李济的硕士论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顺利通过,他还被美国社会学会接纳为会员。但在当时,李济已经认识到人口学的基础是数学,而自己并不长于此,从头学习也不现实,遂明确决定改习人类学,因为在学习人口学之时,他已阅读了不少人类学著作,感觉到人类学“在学术研究上与实际需要上,就成了前途极有希望的学问”。于是在1920年暑假刚过,李济便由克拉克转学去了哈佛,研习人类学。^①

在哈佛的第一年,李济了解到人类学的一般知识,并且初步形成了自己博士论文的构想,1921年3月,他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提出读哲学博士学位的申请,他当时想利用新学的人类体质测量方法,在美国留学生与华侨中搜集中国人体质材料,进而研究中国人种的特质。^②在哈佛学习与研究人类学的过程中,他接触到好几位印象深刻的老师。例如年轻的讲师虎藤(Ernest A. Hooton),他所教授的课程为“体质人类学”,虎藤非常重视训练学生的实践工夫,有一年暑假,李济跟着他处理了五百个埃及人头骨,这一实践经验让李济获益良多。^③又如研究院教务长柴斯教授(Chase),他教授的是“希腊考古学”,正是这门课程引发了李济对于考古学的兴趣。对于哈佛三年,李济认为最珍贵的收获还不在于知识,而是“做学问的境界”:第一,学问的内容不离于日常生活所感;第二,学问最要紧的是方法论,方法论则是“一种常识的推广”。当时

① 当时美国东部大学中,人类学最好的不是哈佛而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泰斗、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就在那里,李济之所以选择哈佛,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对于这所学校的向往,一方面是因为克拉克大学诸师友的劝说。见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

② 李济有一篇《自撰简历》,可能撰于1920年左右,其中提到“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美国当年限制华人入境的理由之一就是华人的脑容量比较小,由此在进化上可能低于白人,李济的那种志向很可能与此种历史环境有关。见《李济传》,第19—20页。

③ 虎藤后来成为了美国体质人类学的权威,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三十年代留学美国时,也跟着他学习体质人类学,从林耀华的回忆来看,虎藤的教学方式仍然保持一贯。见林耀华:《我在哈佛的读书生活》,《读书》1984年第5期,其中“虎藤”译为“胡敦”。

他迫切感受到，“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的现象，方能得到（就中国学术发展的现阶段论）有意义的结果”。

在这样的精神下，李济首先完成了有关中国人体质的论文，得到了老师的好评。其后，李济又根据《古今图书集成》中关于中国城墙的资料，对中国人族群意识之演变进行了研究——*Evolution of the We - Group*（《我群的演变》）。“我群”既已说明，那么如何看待“你群”呢？李济注意到中国民族的移动研究，尤其是历史上汉族的两次南迁，对于中国民族之变迁与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这部分的完稿，李济的博士论文 *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中国民族的形成》）也终于完成，并于1923年5月13日以“极佳”的评语正式通过，遂为中国现代人类学的开山之作，李济由此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并于同年12月成为美国人类学会会员。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李济将论文的主题浓缩为一篇短文《中国的若干人种学问题》，同年2月发表于巴尔的摩的《中国留学生月刊》杂志，次年又刊载于《哈佛研究生杂志》第一百二十三期。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1920年访华后著《中国问题》一书，其中就引用了李济此文的两大段文字，这让李济“一下子出了名”。^① 此时的李济满怀对于未来学术事业的期待，甚至将自己的字也由“受之”改为“济之”，这与胡适的“适之”颇为相类。

值得一提的是，李济在美国与不少中国留学生关系密切。当他登上“南京号”赴美之时，同船即有徐志摩，到了克拉克，两人又住一个寝室，同时他还结识了吴宓、梅光迪、赵元任等人。而在哈佛，与他合住的先后有张欣海、叶企孙、李熙谋等同学。1923年当李济获得博士学位时，其克拉克大学的学长凌冰正担任南开大学教务长，他立即向张伯苓校长推荐了李济。于是李济在同年夏归国以后，遂马上前往天津八里台，就任南

① 直到三十多年后，李济对此还不无感慨地回忆道：“忽然得到若干人的欣赏，真有啼笑皆非之感。但是细想想，那本书的‘看法’似乎还是站得住……可惜……除了几个外国人外，大半的中国历史家，仍是……感到隔膜。”见1955年6月李济致胡适书信。同时参见岱峻：《李济传》，第23—25页。

开人类学、社会学教授。

清华国学院时期

李济在南开颇受器重,第二年又担任了文科主任,不过他只待了两年便回到母校清华,任教于国学研究院。他在南开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结识了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两人可谓一见如故,李济十分欣赏丁氏爽朗、直率的性格,在学问上也谈得很投契,觉得彼此间的意见多有相同之处。1923年8月,在河南新郑县城,百姓掘井发现了一个古墓,北洋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鹏得知后带领士兵发掘,与此同时,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北洋政府教育部、北京大学等机构亦纷纷遣专人参与调查,但发掘并未按考古标准有序进行,墓室遭到了严重破坏。10月,丁文江鼓励李济等前往找寻有无新石器时代遗存,但原发掘现场已遭到破坏,加之兵戈扰攘,李济等人仅工作了两周,除了找到几副人头骨,再无其他收获。此次考古可以说并不成功,但李济通过自己第一次考古工作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①

1922年,清华学校开始筹办研究院国学门(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梁启超时亦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他希望清华能开现代考古学的课程,丁文江推荐了李济,于是国学院聘请李济任讲师。与此同时,弗利尔美术馆的学者毕士博(C. W. Bishop)因为新郑的发掘而结识了李济,也邀请他参加弗利尔的团队,在中国合作进行田野考古。这两项邀请来得突然,并且南开校长

^① 关于这次考古发掘的报告,见李济“The bones of Sincheng”(《新郑的骨》),原载 *Transactions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 1926年第3卷。中国科学社(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于1915年由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创立,并发行《科学》杂志,1918年科学社迁回国内,并创办西文刊物《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同时积极展开各项研究活动,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国科学社一直持续到1960年,在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23年,李济由时任会长的丁文江介绍加入中国科学社,由此也认识了一批国内外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参见张剑:《科学救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回顾》,《科学》2015年第5期。岱峻:《李济传》,第28—30页。

张伯苓的知遇之情也让李济一直铭感于心，他遂与好友丁文江商议此事，丁文江鼓励他为了科学研究而接受新的邀请。1925年，李济进入清华国学院，并且与弗利尔美术馆一起合作，从事中国的田野考古，但前提有两个：第一，弗利尔美术馆必须与中国学术团体进行合作；第二，在中国发掘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弗利尔美术馆表示同意，同时与清华国学院也达成了协议，一切工作在清华名义下展开，经费由美方负担，李济本人则以国学院讲师身份主持这项工作。^①

不过，虽然国学院诸教授对考古学亦颇有兴趣，但旨趣却与李济不无差异。例如梁启超，他于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虽然认为考古学可以提供十分珍贵的古物，但又指出其仅为“人类活动结果中的一小部分”，于史料中占次等位置，价值不宜夸大，而史学家对此之职责乃通过比较中外古物而思考文化之异同，以开阔史识驾驭这些有限的新史料。^②又如王国维，他的二重证据法众所共知，这意味着传世资料首先给地下出土资料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出土资料可以发挥补充、修正的作用，其间的主次关系是明显的，这也是他提议李济“找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地方进行挖掘”的原因所在。^③只是对于李济而言，借助考古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出土文物就可以建构一个相对独立而自足的历史线索，较之历经岁月淘洗的传世文献，这些原始资料所蕴藏的信息更为可靠与清晰，从而具有更强说服力，这里反映出一种学术路径的差异。部分缘于此，李济在国学院的教学并不算出彩，甚至还显得与周围环境有些疏离。1925年，李济在国学院讲授“古物学”与“人文学”，1926年为“普通人类学”与“人体测量”，指导学科范围则为“中国人种考”，1927年讲授“考古学”。^④这些带有强烈自然科学色

① 李济的“讲师”头衔，很可能与他身兼弗利尔美术馆之职有关，其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三百元），清华则只拨发小部分（一百元），李济亦曾表示难以“常年住院，任教授与指导之事”。参见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2—56页。

③ 戴家祥：《致李光谟》，载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④ 岱峻：《李济传》，第38页。